

重大事件

中国近代 革命运动

朱大平 张晓青 编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近代革命运动

朱大平 张皖青 编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革命运动/朱大平, 张晓青编著.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1

(中国历史知识全书)

ISBN 7-5304-1636-7

I. 中… I. ①朱… ②张… II. 中国-近代史 N.K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1789 号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瑞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75 印张 78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3.90 元

中國歷史知識全書

李錫銘

中国历史知识全书

主 编: 朱仲玉

副主编: 曹坎荣 解 镭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马小奇	王东全	王明泽	邓瑞全
刘贵芹	刘淑英	白光耀	史革新
田和珍	许 华	朱大平	朱昌彻
阎春红	汪受宽	杜永菊	李东生
李志英	陈卫平	陈霞村	张文朴
张式苓	张承宗	张福裕	林晓平
范瑞祥	孟庆荣	闻惠芬	胡逢祥
赵敬寰	赵籍丰	郭玉兰	郭齐家
郭英德	贾卫民	章义和	梁 晔
谢俊美	靳生禾	郑一军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历史故事的形式,描述了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直到 1919 年,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财富,残杀中国人民;腐朽的满清统治者卖国求荣,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封建军阀的独裁与卖国。同时描写了中国人民历次掀起对中外反动势力英勇斗争的情况,并分析了这些革命运动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

前 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十分悠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外来的侵略势力和内部的腐朽统治奋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了无数受人敬仰的英雄豪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军事家，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的发展既然如此丰富多彩，每一个中国人自然很有必要学习自己祖国的历史。通过学习历史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进而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祖国的统一、繁荣富强作贡献。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学习祖国的历史尤为必要，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学习祖国的历史能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今年八月，中央宣传部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把进行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教育和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指出这些都是向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正是为了发掘这宝贵的资源，我们编辑出版了这一套《中国历史知识全书》，目的就是想让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能掌握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历史灿烂辉煌的

一面和受过挫折屈辱的一面,从而给爱国主义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为谱写中国历史的新页下定决心。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业,相信定会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初步拟定了包括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灿烂文化、辉煌科技四个系列的 50 个选题先行出版,希望能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反映中国历史的主流与特点,使读者能从中认识中国历史的基本面貌并了解其发展规律。以后还将根据需要,陆续加以补充和完善。

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预定目的,欢迎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与建议!

《中国历史知识全书》编辑委员会

1994 年 11 月

目 录

一、反侵略反封建群众运动	(1)
1. “三元里前声若雷”	(1)
2. 广州反入城斗争	(4)
3. 反对教会侵略的巨浪	(6)
4. 抗捐、抢米风潮	(10)
5. 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12)
二、农民革命风暴	(19)
1. 太平天国运动	(19)
2. 苗、回民起义	(41)
3. 义和团运动	(46)
三、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	(60)
1. 国难当头	(61)
2. 公车上书	(64)
3. 百日维新	(66)
四、辛亥革命风云	(69)
1. 民主革命的勃兴	(70)
2.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79)
3. 武昌起义与民主共和国的诞生	(85)
4. 袁世凯窃国与二次革命	(90)
5. 洪宪帝制与护国运动	(96)
6. 段祺瑞的独裁卖国与护法运动	(103)
7.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07)

一、反侵略反封建群众运动

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国历史蒙受巨大的屈辱。而近代统治者的无能与腐败，使革命的群众站在了反抗外来侵略的前沿阵地。零散、自发、迫于激愤的群众斗争成了近代革命的重要力量。在中国，侵略者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广大人民在一系列自发进行的反侵略斗争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 “三元里前声若雷”

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的残暴行为，不断激起群众的愤怒和反抗。在沿海人民的抗英斗争中，广州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斗争，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面旗帜。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五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1841年5月27日《广州和约》签订后，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甚至盗掘坟墓，城北一带乡村，顿时成了鬼蜮横行的地方。

5月29日清晨，小股英军在广州北郊三元里肆行抢劫。菜农韦绍光等义愤填膺，当场打死英军数人，其余见势不妙，狼狈而逃。三元里人民料定敌人会疯狂反扑，全村人民同仇敌忾，在村北三元里集合，以庙里的三星旗作为“令旗”，大家立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宁死不屈”；“打死无怨”。同时，他们还串联附近103个乡的群众，约定鸣锣示警，一乡报警各乡

支援。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城北各乡人民群众迅速组成浩浩荡荡的自发的抗英武装力量。这支队伍中有贫苦农民，有打石工、丝织工，有渔民、盐民，也有爱国士绅和有功名的知识分子，而以农民的人数最多，成为斗争的主力军。

5月30日黎明，五六千群众向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挺进。当守卫炮台的1000余名英军在司令卧乌古等的率领下反扑过来的时候，群众且战且退，把敌人引到牛栏岗附近的丘陵地带。卧乌古见势态不妙，下令撤退，但为时已晚！一声锣响，喊杀声顿时震荡山谷。早已埋伏在此的近万名群众，手持大刀长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英军。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立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直至中午，霹雳惊天，电光闪闪，大雨倾盆。英军枪炮淋湿，不能使用，加之四面皆田，道路泥泞，敌军寸步难行，士气低落，胆战心惊。三元里人民则精神抖擞，愈战愈勇，他们以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对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各乡群众乘机分割包围，英军官兵“乞命之声震山谷”。广大群众看到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原形毕露，“众口喧哗，笑声闻十里。”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这时，他发现三十七团第三连“失踪”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晚上9时，水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来复枪连队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一个结

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方撤退。但他们仍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其中1名士兵被打死，1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重伤。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约50名，缴获大量战利品，战果辉煌。人们热情赞颂：“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胜利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5月31日，数万群众乘胜追击，从三元里向四方炮台挺进，把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人民群众的队伍声势浩大，旌旗招展，刀矛如林。敌人龟缩在炮台里，一动也不敢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派奸细混出重围，向清朝官吏求救。要他们出面解散群众队伍，否则英军将解除和约，继续攻城，烧掉附近每个村镇。奕山经敌人一吓，果然温顺就范，赶紧委派广州知府余保纯等出城替英军解围。余保纯来到人民群众面前打躬作揖，央求群众撤围，可是群众早已恨透这个卖国贼，对于他们的可耻表演，有的怒目相对，有的当面骂他是卖国通夷的汉奸。余保纯感到无计可施，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说：“如果乡民不退，将来万一有事，要由你们负责。”士绅们经不起余保纯的一吓一压，有的丢下群众溜走，有的立即和余保纯站在一起，欺骗群众，要他们赶快回家。这样，英国侵略者在清朝官吏的帮助下，灰溜溜如丧家之犬，逃出重围。

群众队伍被拆散了，但抗英烽火并没有熄灭。6月1日，英国侵略军撤出虎门。7月，英国侵略军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贴出了一张告示，大言不惭地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群众看后极为愤怒，立即针锋相对地贴了一张告示，名叫《申谕英夷》，强烈谴责英国侵略者的罪行，并满怀信心地表示：“尔今如此可恶，我们痛恨已极，若不杀尽尔等猪狗，便非顶天立地男子汉。我们一言既出，万不折回，一定要杀，一定要砍，一定要烧死尔等。”这篇“文告”，发扬了大

无畏的革命精神，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祖国反抗侵略的决心和意志。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使人民群众初步懂得：“官兵不足恃”，“鬼子不足怕”，“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它以英雄的气概，辉煌的战果，谱写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斗争的光辉篇章，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表明人民群众是反侵略的主力军。它激励着近代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开展反侵略斗争。

2. 广州反入城斗争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这个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烈焰。在通商口岸和香港、澳门等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相继展开，其中尤以广州反入城斗争，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

经过鸦片战争和三元里斗争，广州人民不仅对英军烧杀淫掠的罪行恨之入骨，而且“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深知英夷之不足畏”。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以“社学”形式组成抗英武装，阻止英军入城。

“社学”，又称“义学”、“书院”。鸦片战争期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人民自发要求抗英，一部分爱国士绅也投入反侵略斗争的行列，“社学”因而成为团结和组织乡勇进行抗英武装斗争的合法形式。从1841年6月广州西北石井士绅李芳等筹设“升平社学”起，到1849年，广州以及附近南海、番禺、从化、花县、增城等地，已按“社学”和团勇的组织，集结了几十万人的

抗英队伍,其中以广州附近的升平、东平、南平、隆平等“社学”最为著名。爱国士绅在“社学”中起着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店员、城市贫民以及天地会大众,成为“社学”的基本群众。1842—1849年间,广州人民在社学推动影响下掀起了一系列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

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一向居住在广州城外珠江畔的洋馆。1843年7月,英国商人要求入城贸易和租地建屋居住。城乡人民舆论沸腾,坚决反对。清政府官员则见风使舵,时而“抑民抚夷”,时而“顺民阻夷”。这场为了不准洋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与腐败的清政府所订不平等条约的顽强抗争,对封建统治者卖国投降的坚决抵制。

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844年5月,英国要求在广州河南地区租一块地,清朝的地方官为了满足侵略者的要求,也强迫人民出租土地。愤怒的群众在“社学”领导下,会合48个乡的3千多名群众,到洋馆抗议示威。由于群众的强烈反抗,英国侵略者不得不暂时放弃在广州城建立租界的罪恶企图。

1846年1月,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乘兵船直驶珠江,胁迫两广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联衔发布告示,准许英人进入广州城。群众立即把告示撕掉,贴上“倘外人入城,义民将攫官而诛之”的揭贴。耆英派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密定进城日期,“社学”侦知后,立即在城厢内外遍贴揭帖,约定在英国人进城那天,关闭城门起事。1月14日,当刘浔与英人交涉后回到广州时,数千名群众的愤怒一发而不可遏止,他们冲进刘浔的衙门,烧毁他的官府,声言要找这个卖国贼算账。面对愤怒的群众,刘浔吓得心惊肉跳,只好跳墙而逃。“社学”又出揭贴,约期攻打洋馆,德庇时怕事态扩大,被迫带兵退

回香港。

英国侵略者气焰嚣张，妄图凭借武力强行入城。1847年4月，德庇时率大小军舰20余艘，侵略军1千余名，偷袭虎门，闯入省河，炮击广州城，提出包括进城在内的7项要求，限8小时内答复。耆英害怕激起民变，与英国秘密谈判，约定两年后允许入城，以渡过眼前难关。

1848年，徐广缙接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叶名琛授广东巡抚。这一年，新任香港总督文翰继任英国驻华公使。1849年2月，文翰根据耆英的许诺，要求入城，并以武力相威胁。广州的抗英武装同仇共愤，很快行动起来，“城厢内外街之团勇，户户出兵，合计不下十万余人。”徐广缙权衡利弊，采取“顺民阻夷”的办法，在4月1日照会文翰，拒绝英人入城。文翰对此极为不满，率领军舰闯入省河，想用武力强行入城。“社学”群众十万人守卫珠江两岸，严阵以待，呼声震天，决心与侵略者拼个你死我活。文翰慑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威力，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暂时退出珠江。4月11日复照徐广缙，表示以后不再讨论进城之事。

广州人民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的抗争，挫败了侵略者强行入城的计划。事后，文翰也不得不供认：“附近民众和团勇会坚决抵抗我们入城，结果使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抵抗力量比1841年第一次抵抗时强得多。”

3. 反对教会侵略的巨浪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自由传教”的借口下，在不平等条约中取得了利用教会在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许多特权，传教士来华人数激增，到19世纪末，欧美天主教、耶稣教和沙

俄东正教在华传教士多达 3300 余人，他们的活动范围从滨海沿江的都市侵入到内地和边疆。这些传教士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伸出了罪恶的魔爪。许多传教士为其本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充当谋士，在各国侵略行动中充当间谍，他们与媚外的中国官吏勾结起来，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外交，还残酷地剥削中国人民，掠夺财富，鱼肉百姓，不断挑起民族纠纷。

外国传教士的种种恶劣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于是便把反侵略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外国传教士。从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从南方的滇、黔，到北方的直、鲁，从东海之滨的福建，到喜马拉雅山麓的西藏，各族人民掀起了反教会侵略的巨浪。

从 1861 年贵州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到 1870 年爆发“天津教案”，形成了中国人民反对教会斗争的第一个高潮。

早在 16 世纪中后期，法国天主教势力就开始觊觎贵州这块宝地。他们在贵州各地强买土地，勾结地主，征发民力，修建大小教堂，因而激怒了贵州各族人民。从 1756—1860 年贵州先后发生教案 16 起，传教士及教徒被杀者 13 人，被打伤 100 人，并有许多教徒脱离天主教。1861 年，法国天主教贵州主教胡傅理以《天津条约》为护符，在贵阳强行“传教”，横行无忌，而且公然违反法令，仿照清政府省级军、政大员的规格，招摇过市，激起公愤。贵州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联名向全省官吏发出公函，斥责天主教为“异端邪说，最为害民”，指出教会“肆行无妄，心实叵测”。令各地“随时驱逐”或“借故处之以法”，并以扑灭洋教是否积极为地方官考核的依据，公函在全省引起了迅速的反响，青岩团首赵畏三派兵包围姚家关天主教堂大修院，处死 3 名修士，查收教院内一切财物，放火烧了

大修院。这一事件推动了贵州附近反洋教斗争的声势。1862年2月,开州知府戴鹿芝又以群众控告法国传教士文乃尔破坏礼俗和政令,把文乃尔及教士教民4人逮捕处死。这时全省仇教、反教的情绪越加高涨,法国天主教在贵州的“威信”扫地。

贵州首先驱逐了传教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怒火迅速燃遍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直隶、内蒙、西藏和台湾等地区,1870年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1870年6月,由于天津法国天主教堂迷拐和残害幼儿的罪行,激怒了天津群众,他们纷纷涌向教堂和领事馆抗议,法国领事馆丰大业竟威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还向到现场劝说群众的知县刘杰开枪,打伤刘杰的随从。怒不可遏的群众当即将丰大业打死,并烧毁教堂和领事馆,又打死洋人20名,事后,英、法、德、俄、比、美等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烟台一带示威。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抱定媚外方针的清政府,以杀民谢敌的行径开了重刑镇压反洋教斗争的恶例。清政府以杀害群众16人,缓刑4人,充军25人,赔款白银49万两,对法道歉了结此案。

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并未因清廷的镇压而减弱。在中法战争中,地处抗战前线的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人民群起焚烧教堂,驱逐传教士,自发地把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与保卫边疆的斗争结合起来,又一次掀起反教会斗争的高潮。

进入90年代,各地群众反洋教斗争发展为大规模武装斗争,把运动推向了更新的高潮。

四川大足县群众具有反洋教斗争的光荣传统。早在1886—1887年间,曾两次捣毁龙水镇法国教堂。1890年,龙水镇法